

[文章编号] 1003—4684(2019)06-0072-04

柬埔寨华校小学生个体量词语用习得

郭 敏

(湖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8; 暨南大学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 柬埔寨华校三到六年级小学生的个体量词在语用方面表现出的习得顺序为:先掌握量词及与其搭配名词的词汇意义,再关注其语用意义(先泛化语用意义,既扩大其使用范围,再与母语中的非语言因素意义产生竞争),最后逐步掌握,学生习得这些量词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调整词汇意义、语用意义及非语言因素的意义,并逐步向目的语靠近的过程。

[关键词] 个体量词; 词汇意义; 语用意义

[中图分类号] H740.35

[文献标识码] A

个体量词的学习是外国学生汉语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难点,一部分个体量词(如量人个体量词位、帮、伙等)除了具有一定的词汇意义之外,还有语用意义,即使是学了几年汉语的学习者都很难全部掌握。因此,对量词语用意义的研究显得很重要。

在已有研究中,量词的搭配或认知研究成果非常多,而语用的研究成果较少。对量词习得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母语儿童为研究对象考察量词的习得,找出不同年龄段(主要是 1—7 岁)儿童习得量词的特点与影响因素;二是针对成年二语者的量词偏误分析,这类研究主要是找出各类量词的偏误情况并指出相应的教学策略。暂时还没有发现针对二语者(尤其是儿童)的个体量词语用习得方面的研究。

田鑫^[1]通过比较汉语作为第一语言的量词习得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量词习得,指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被习得时,名量词和动量词可以同时学习,各个小类出现与否也是由所学的内容来决定的,随机性与主观性较强。那么作为名量词下的小类,个体量词在作为第二语言习得时,其语用意义是随机、主观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 如果有规律,这些规律又是什么?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柬埔寨本克蒙省三州府新民学校的华校学生 3

—6 年级学生(三年级 27 人,四年级 19 人,五年级 12 人,六年级 14 人,共 72 份试卷,全部有效)。之所以选择三至六年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一二年级学生的汉语水平不高,很少使用量词,再加上柬埔寨的教学方式很传统,一二年级的学生的练习基本上是抄写正确的词语,学生害怕犯错误,大量学生会以“个”来代替。

1.2 研究目的

找到柬埔寨小学生量词习得的顺序或规律。

1.3 研究步骤

1)找出《华文》(《华文》是由柬埔寨东华理事总会编,用于柬埔寨华文小学,1—6 年级共 12 册)教材中的所有的名量词及其搭配,挑出其中使用频率高、搭配名词多的一些名量词。

2)再从(1)的结果中挑选使用频率较高的个体量词,再根据课文中的搭配情况来设计书面练习(即问卷)。

1.4 研究方法

语言习得发展模式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一是对某个或某群学习者进行一段时间的跟踪调查研究,二是同一时间对不同程度(高中低)学习者展开调查研究。本研究采用第二种方法获取语料,即通过横向语料获取纵向数据。具体来说,设计问卷让 3—6 年级学生同时完成(横向),获取不同年级学生(纵向)习得个体量词的数据并加以分析,发现问题后再有针对性地进行访谈。

[收稿日期] 2019—03—07

[第一作者] 郭 敏(1979—),女,湖北仙桃人,暨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北工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理论与二语习得

问卷的设计:设计了考察学生个体量词的语义、句法和语用掌握情况的测试题,本文只探讨涉及语用的个体量词的用法。

访谈的目的:在测试之后访谈,进一步了解学生运用量词的心理过程与学习策略。

2 研究内容与分析

表 1 是统计各年级学生使用个体量词的数据。

表 1 各年级使用情况百分比排序				%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D 个 21.76	A 位 25.65	D 个 26.04	A 位 30.35	
A 位 21.75	D 个 20.39	B 尊 17.71	D 个 24.10	
B 尊 8.33	B 尊 13.81	A 位 16.66	B 尊 20.53	
C 伙 6.01	C 伙 12.5	G 头 10.41	E 帮 11.60	
E 帮 5.55	E 帮 9.86	C 伙 9.37	C 伙 5.35	
G 头 4.62	F 只 7.89	E 帮 9.37	F 只 4.46	
F 只 3.24	G 头 7.23	F 只 6.25	G 头 3.57	
空 28.24	空 2.63	空 4.16	空 0	

由表 1 知:使用百分比最高的前三个量词是“个”“位”“尊”。而正确使用的排序应该是“个”“帮”“位”“伙”“尊”。问卷设计的答案并非单选,但学生全部都是按单选来做的,这反映了学生对量词的优先选择意向。在统计时,通过正确使用率来观察学生对这些量词的掌握情况。

下面将逐个分析这些个体量词的使用情况,并结合访谈来解释学生使用这些个体量词的心理因素。

2.1 个

“个”本身是一个使用面最广、搭配名词最多的一个个体量词,也因此受二语者的欢迎,尤其是初学者。不管在哪个阶段这个量词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使用频率非常高。此现象的产生,与课文内容有一致性,课文中量词“个”的使用频率高,类型丰富(有时间、地点、人物等)。由于“个”的输入频率高,学生自然也会大量使用“个”,并且泛化使用于各类名词前,把“个”当万能量词使用(表 2)。

测试中(没有语境),“个”除了不能用于“佛像”外,可以与其他所有名词搭配,学生的正确使用率也很高,都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2.2 位

“位”的出现分担了“个”的负重,由于“老师”是学生用到的高频教学用词,因此学生一开始就知道其正确搭配,准确率也非常高。三年级中 27 位同学中有 26 位将“位”与“老师”放在一起,随着年级的增高,学生知道“位”还含有“尊敬”的语用意义,但是无法准确地与名词搭配使用,于是泛化使用于各种名词之前,直到六年级才真正集中地用于“表示尊敬”

的对象前(表 3)。

表 2 量词“个”在不同年级的使用情况				
个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敌人	3	3	4	7
坏人	13	6	4	5
和尚	1	1	1	1
佛像	3	1	1	1
植物学家	2	2	1	1
老人	3	3	3	1
老师	1	3	5	
学生	21	12	6	11
使用率/%	47(21.76)	31(20.39)	25(26.04)	27(24.10)
正确使用率/%	93.61	96.77	96	96.29

表中的数字代表学生答题的次数,百分比代表使用率和正确使用率。使用率=年级答题总次数÷(该年级人数×题数),如三年级共 27 人,测试题数是 8,三年级答“个”的次数是 47,因此三年级“个”的使用率是 $47 \div (27 \times 8) = 0.2176$ 即 21.76%。正确使用率是指正确使用“个”的次数除以总次数

表 3 量词“位”在不同年级的使用情况				
位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敌人	2			1
坏人		1	1	
和尚	2	5	2	3
佛像	3	1	1	1
植物学家	3	3	2	4
老人	11	9	5	11
老师	26	16	4	14
学生		4	1	
使用率/%	47(21.75)	39(25.65)	16(16.66)	34(30.35)
正确使用率/%	89.36	71.79	81.25	94.11

如果将表 3 中“位”的使用率和正确使用率转换成折线图(由于数据简单,篇幅有限,我们不在此列出,下同),可以看出“位”的使用率先有波折然后直线上升,正确使用率在四年级稍有降低,五六年级直线上升,这反映出学生掌握“位”的用法是一个先有反复而后直线上升的过程。

2.3 伙

当量词“伙”直接与名词搭配时,表现为明显的消极语义韵,据吴海霞统计与量词“伙”搭配的前十的名词的语义倾向中,有 2%是积极语义、61%是消极语义,还有 37%是无明显语义倾向的,她认为“伙”应该绝对避免与积极语义韵的词语搭配使用^[2]。可见,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伙”应该与带有明显消极语义韵的词如“敌人”“坏人”搭配使用。

由表 4 可以看出:三、四年级“伙”的正确率高于五六年级,可见学生对“伙”的掌握并未随年级的增高而变得更好。估计是由于教材中“伙”没有及时重现而导致学生遗忘,但学生遗忘的是其语用意义,而没有忘记其核心的词汇意义。对学生的访谈验证了这一点,学生以为“伙”就是“很多人”,于是直接当成

“很多人”使用,用于各种对象上。这也提醒教材编写者应考虑词语的复现问题。

表 4 量词“伙”在不同年级的使用情况				
伙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敌人	5	5	1	
坏人	3	5	1	2
和尚		1		
佛像	2	4	2	1
植物学家	2	4	2	1
老人	1		1	
老师				
学生			2	2
使用率/%	13(6.01)	19(12.5)	9(9.37)	6(5.35)
正确使用率/%	61.53	52.63	22.22	33.33

2.4 帮

当“帮”与名词搭配时,消极语义韵程度明显大于积极语义韵程度,据吴海霞统计:与量词“帮”搭配的前十的名词的语义倾向中,有 11%是积极语义、47%是消极语义,还有 42%是无明显语义倾向的^[2]。可见“帮”主要用于消极语义和中性语义中,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一般不用于“佛像”“植物学家”“老人”“老师”。从“帮”的正确使用率来看,学生对“帮”的掌握也并未随年级的增加而提升。但是,从使用的分布情况来看(表 5),“帮”的分布越来越接近母语者,集中于“敌人”“坏人”。由一开始的广泛用于各类名词前到不用于“值得尊敬”的对象上,如六年级不用于“和尚”“佛像”“老人”和“老师”,这是对“帮”的语用意义逐步熟悉的一个过程。

表 5 量词“帮”在不同年级的使用情况				
帮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敌人	5	7	3	4
坏人	2		2	5
和尚	1		1	
佛像		1	1	
植物学家		2	1	3
老人	2	2		
老师			1	
学生	2	3		1
使用率/%	12(5.55)	15(9.86)	9(9.37)	13(11.60)
正确使用率/%	83.33	66.67	66.67	76.92

由表 5 发现:六年级学生中仍有三人将“帮”用于“植物学家”,访谈的结果是这些学生不知道“植物学家”的意思。可见,语义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心理词典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是学习者组合词语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3]。如果不懂量词所搭配名词的语义,仍然无法生成正确的搭配。因此只掌握量词的词汇意义是不够的,除了量词的词汇意义之外,还要掌握其搭配名词的词汇意义,这也间接印证了语义句法的双向选择性理论,即名词与量词的组合不是所谓“约定俗成”的,而是在“语义一致性原则”的基

础上进行的相互选择^[4]。

2.5 只、头

“只”“头”在汉语中是不能用于人的,但是在柬埔寨语言里,量词“头”是可以与“敌人”搭配组成“一头敌人”,就像说“笨得像一头猪”一样,我们用比喻,柬埔寨语不用修辞,直接用量词表达贬义。由表 6 发现,三年级的学生主要将“只”用于“植物学家”,通过访谈了解到学生这样用是因为不知道“植物学家”的意思,以为与“动物”类似,所以用了“只”,可见词汇意义的重要性。实际上,“植物学家”是课本 5(三年级上)出现的生词,可能是因课文中没有复现导致学生遗忘。将“头”用于“和尚”是因为学生以为“头”是人体部位的“头”,“和尚”是光头,突出了其头部。

表 6 的使用全部都是错误的,但是可以反映出二语者选择量词的心理过程:由一开始的不知道搭配词的词汇意义,到掌握词汇意义并开始关注语用意义(如五、六年级“只”“头”不用于自己认为值得尊敬的人身上),这是一种进步。但由于受到其母语的影响,将“只”“头”用于“敌人”“坏人”之前(这种用法与柬埔寨语量词的使用一致,是一种母语负迁移)。

表 6 量词“只”“头”在不同年级的使用情况								
年 级	三 年 级		四 年 级		五 年 级		六 年 级	
	只	头	只	头	只	头	只	头
敌人			1	3		3		2
坏人		1	1	3	2	2	1	1
和尚		2	1	4				
佛像	2	3	1	1				
植物学家	5	4	8		3	2	4	1
老人						1		
老师					1			
学生						2		

2.6 尊

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学生对“尊”的掌握有这样一个过程:在掌握“尊”的词汇意义(由“尊敬”可知)及与其搭配词“佛像”的意义之后,学生逐步关注到“尊”的语用意义,将这种表示尊敬的语义广泛用于各种值得尊敬的对象上,如“老人”“老师”,出现“一尊老人”“一尊老师”的搭配。随着年级的增加,学生又逐步缩小其使用范围,集中用于“和尚”和“佛像”之前(由表 7 的分布情况可见)。因此,“尊”的正确使用率也呈上升趋势。

为什么“尊”除了与“佛像”搭配外,还用于“和尚”之前呢?因为柬埔寨是信奉佛教的国家,柬埔寨的男性,上至国王下至平民,一生中都要出家剃度当和尚。社会也将出家当和尚看作是一件喜事,剃度当和尚甚至是判断人品的重要标准,当过和尚的人还俗之后在求婚、就业等方面还有优势。因此,和尚在柬埔寨的地位很高,是人们尊敬的对象,学生用

“一尊和尚”，这与他们的文化认知是一致的。可见，在掌握了量词的词汇意义与语用意义之后，还要与其母语文化的认知产生竞争，最后才能准确使用。这与张淑静研究二语心理词汇和母语心理词汇差异的观点是一致的，导致这些差异的因素既有语言因素，也有非语言因素。语言因素包括二语者对词义理解的不准确等，非语言因素包括地理环境、文化、经济、宗教信仰及重大事件的影响^[5]。“尊”的选择与汉语母语者不同便是由其宗教信仰等因素造成。

由“尊”“只”“头”的使用可以看出，学生在掌握了量词的词汇意义之后，开始关注其语用意义，但是会先泛化其语用意义扩大使用范围，再与母语中的文化意义产生竞争，最后逐步缩小使用范围直到正确掌握。

表 7 量词“尊”在不同年级的使用情况				
尊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敌人	4		1	
坏人				
和尚	8	6	7	10
佛像	3	10	6	11
植物学家				
老人	3	5	2	2
老师			1	
学生				
使用率/%	18(8.33)	21(13.81)	17(17.71)	23(20.53)
正确使用率/%	16.67	47.61	35.29	47.82

3 结束语

柬埔寨本克蒙省三州府新民学校的华校 3—6 年级学生在个体量词习得过程中，表现出的量词内

部的习得顺序是：先掌握量词的基本词汇意义，在熟练掌握量词及其搭配名词的词汇意义之后，初步意识到语用意义的重要性，但对语用意义的掌握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先泛化使用其语用意义，主要表现为扩大其使用范围，然后再逐步缩小使用范围但又与母语中的非语言因素等产生竞争，最后才逐步掌握。学生习得这些量词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调整词汇意义和语用意义及非语言要素相关的意义，并逐步向目的语靠近的过程。

当然，由于我们的研究材料有限，研究对象也仅限于柬埔寨的小学生，可能存在片面性。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词语的语用研究，是否适用于其他二语者？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田鑫.第一语言及第二语言的量词习得对比研究[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09(3):95-96.

[2] 吴海霞.基于语料库的汉语量词语义韵考察——以“群”“帮”“伙”为例[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8(4): 59-65.

[3] 吴平.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M].上海:兴届图书出版公司,2012.56.

[4] 周芍.名词量词组合的双向选择研究及其认知解释[D].广州:暨南大学,2006.

[5] 张淑静.二语心理词汇与母语心理词汇的差异[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5):103-107.

Study on Pragmatic Acquisition of Individual Quantifiers by Chines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Cambodia

GUO M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 Hubei Univ. of Tech.,Wuhan 430068,China ;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rue , Jinan Univ.,Guangzhou 51000,China)

Abstract: The acquisition order of individual quantifiers in the third to sixth grade of Cambodian Chinese School is as follows: the lexical meaning is first acquired prior to its pragmatic meaning. The process of the students’ acquiring these quantifiers is a process of constantly adjusting the lexical, pragmatic and cultural meaning, and gradually approaching the target language.

Keywords: individual quantifier; lexical meaning; pragmatic meaning

[责任编辑：张岩芳]